

【学科建设】

# 内史与外史：科学社会主义的 两种学科史叙事

万晓宏 杨 婷

**【摘 要】**学科史书写是学科合法性阐释和学科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基石。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政治合法性和学理合法性相较于其他学科,具有更深层次的诉求,且二者之间的博弈和融合贯穿学科发展始终。综观其学科史叙事,角度不同、方式各异。根据库恩划分科学史的相关理论,可把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的叙事分为内史和外史两种类型。从书写方式来说,内史可进一步划分为“以范式理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三种;外史可划分为“以学科建制化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两种。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两种叙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其学科本身发展脉络,也能通过内史与外史的联结和对比,探索在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生活之间构建独一无二的学科体系。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内史;外史

**【作者简介】**万晓宏,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婷,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006)。

**【原文出处】**《新视野》(京),2022.4.83~90

学科史是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学科史书写是学科合法性阐释和学科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基石。学科史书写方式各异,在早期西方学科史的规范化叙事中,有学者总结归纳出学科发展所历经的过程,以此作为蓝本来书写学科史。德国医学史研究专家 Engelhardt 曾概括提出学科发展需要历经的 11 个阶段:奠基和自治化;方法化;经验化;系统化;学科术语的建立;职业化;机构化;文献化;促使学科的合法性;转移到其他科学领域;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被接受。<sup>[1]</sup>学者 Guntau 和 Laitko 也曾将学科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学科史的史前史;严格意义上学科的起源;学科的建立。但是,中国的学科发展过程与西方不同,其学科建立不是一个学科分化过程,而是一个被接受的过程。<sup>[2]</sup>这造就了中国学科的历史发展进程别具一格。尤其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来说,其产生与发展相较于其他学科而言,政治合法性和学理合法性都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其政治性和科学性的博弈与融合贯穿始终。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且独具魅力。

学科史的书写角度多样、切入点各不相同。就广义的学科史来看,既包括“形上”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也包含“形下”的社会政治变迁史,以及二者的“中间环节”——学科本身的塑形史。而这三者不同的巧妙结合就会形成学科的“内史”与“外史”。托马斯·库恩在为《国际科学史百科全书》撰写“科学史”词条时,就曾将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内部史(in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与科学外部史(ex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内部史关注科学知识之成长过程,而外部史则把科学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sup>[3]</sup>即学科“内史”是关注学科本身的“中间环节”,学科“外史”更注重考察学科“形上”的学术思想和“形下”的社会政治变迁对其发展的推动与规训。观察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的书写方式,就会发现其学科史的书写亦是如此,仍未跳脱学科内部史与外部史这两种书写模式。就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的“内史”而言,又可以细分为“以范式理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三种书写方式。就“外史”来看,可以划分为“以学科建制化为中心”和“以‘人’为中

心”两种书写方式。学科史“内史”和“外史”都有“以‘人’为中心”的书写方式,但切入点大相径庭。以下分两部分来讨论,并进一步展示内史与外史之间的逻辑关联。

### 一、学科史书写的“内史”叙事

学科的内部史主要关注学科框架体系的建构、自身知识理论的更替、学科研究方法的确立等。研究发现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内史的书写可以细分为三类:“以范式理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其中“以范式理论为中心”扎根于科学社会主义范式理论的形成与变迁;“以问题为中心”侧重于对学科实践问题的探讨,“以‘人’为中心”则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学人为研究视角,总结归纳其学术思想,并以“学科带头人”“学界精英”等的学术历程及其对本学科的贡献为线索,划分学科发展阶段。

#### (一)以范式理论为中心

“范式”通常被认为是“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sup>[4]</sup>“范式”界定了学科研究范围和内容,科学共同体在一种范式或一组范式的规定下,进行规范化的专业交流和研究。范式既为“公认的科学成就”,即意味着它不是学科伊始就天然存在的,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辩论,进而某一种理论模式受到科学家普遍认同之后,才产生了科学共同体公认的范式。<sup>[5]</sup>在知识体系内部,范式之间的辩论与竞争意味着知识的革命与进步。恰是范式之间的转换与更替共同构建了学科体系框架的发展脉络。同样,在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的书写中,以范式理论为中心的学科史构建方式聚焦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内部各范式理论的转换与更替,相互交织形塑了整体的学科发展历史。

在各学科学科史的书写中,以范式理论为中心的叙事方式很常见,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也不例外。从近些年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典教材的编纂中可见一斑。赵明义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高原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由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九所院校联合编写组编写的,青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由中国人民

大学社科系科社教研室编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包括由王怀超、秦刚主编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的研究生教材《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等大体上都分为两大部分来书写:一是无产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而斗争的理论和策略;二是无产阶级为创建共产主义新世界而斗争的理论和策略。学者按照时间或理论线索,将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范式串联起来。这种形式所构建的学科史更倾向于学术史,专注于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研究。

#### (二)以问题为中心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内部史的研究也同样具有特殊性。如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学术界曾展开了激烈的探讨。有学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能称其为一门学科,换言之,不能划归为一门独立学科。<sup>[6]</sup>但是大多数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在党校、普通高校等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毕竟作为是一个学科而存在的。<sup>[7]</sup>同样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名称学术界至今仍有疑义。依据1990年发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科学社会主义属于法学学科门类,隶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1997年修改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原属于国际政治一级学科)两个二级学科合并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放教授就曾主张以“社会主义学”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学科名称。<sup>[8]</sup>还有学者建议将科学社会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sup>[9]</sup>当然,作为一门特殊学科,关于其特殊性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王怀超对学术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史中的一系列研究问题做了系统阐释,包括对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逻辑起点等问题的着重论述。<sup>[10]</sup>

高放用25个问题串联描绘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理论研究动态:1.关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由理论变为现实的问题;2.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时代问题;3.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阶段和时代问题;4.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规律问题;5.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问题;6~24是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相关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问题等。最后还提出了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和需要研究的问题。<sup>[11]</sup>这25个问题基本囊括了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内部的所有理论问题。

当然,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和需要研究的问题,随着国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在新时期、新阶段遇到的各种矛盾中应运而生并不断扩展。如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议题,自此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否应该纳入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范畴,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相关研究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纵深推进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学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深刻依据。<sup>[12]</sup>关锋也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使科学社会主义从抽象原则到具体实践、从基本理论到鲜活现实、从价值诉求到实践履不断转化的结果。<sup>[13]</sup>包括在202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最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部分,都有专门的一小节讲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相关研究中,我们既要警惕科学社会学过度宽泛化,只强调学科的综合性和忽视学科特性;也要防止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一味地缩略化,局限于特定的研究范畴,将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不断拓展学科研究范畴,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来丰富科学社会主义新课题。

### (三)以“人”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的书写方式来划分学科史发展阶段屡见不鲜。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中以“人”为中心往往是以学科泰斗为中心,将各泰斗的权威理论内容串联在一起,不同学家的经典理论自成一派,后来者或批判或继承前者的理论观点形成又一新理论、新学派,自此“前江后浪”共同勾勒出一幅学科发展

脉络图。内史中的以“人”为中心,仅将“人”及其理论作为学科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志,并未涉及学人与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恰是这一点区分了内史和外史中的以“人”为中心的书写方式。同时,这里“人”的理论与前文中的范式理论也并不冲突,只是划分学科史发展阶段的标准不一。前者聚焦于学人及其学派,后者则更侧重于理论。二者不可避免存在重合部分,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学人与学科及理论的关系密不可分,学人是学科的创立者,也是学科理论的缔造者。以“人”为线索划分学科发展阶段,对于厘清学人与学科的互动关系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中,这类的书写往往是从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到列宁、斯大林等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向现实制度的飞跃,再落地到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包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观以及集大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2004年由薛汉伟、陈锡喜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教育部组编、高等学校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系列教材之一,以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为主线,总结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论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sup>[14]</sup>2009年由乔耀章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同样作为研究生教学用书,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社会主义观。<sup>[15]</sup>

由此,可发现以“人”为中心的书写方式则更倾向于思想史,专注于各学派代表学家的核心思想,并以此为线索作为划分标准,进而串联编辑成册,试图推演整体的学科发展历史。

## 二、学科史书写的“外史”叙事

仅注重学科内部知识体系形塑的内部史越来越受到外部史的冲击。众多学者开始反思,仅关注知识的内在逻辑和脉络是否能够完整地呈现学科的发展史。他们普遍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科学史



都是内史。而内史向外史的转换被认为始于莫顿的《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外部史成为科学史研究新风向。Multharf认为其任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从1964年到1978年的这15年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科学史研究开始由内史向外史转换。<sup>[16]</sup>内史和外史之争的关键在于内部知识体系的演化是否会受到外部影响。在历史研究中描述性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有描述性研究远远不够，需要不断探索新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将学科发展的历史置身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的外在土壤中，观察不同的“土壤环境”对于学科或推动或规训的动态历史过程，这即是学科外部史的使命。探究学科外部史极为必要，这一点从学科的产生中即可窥得一二。比彻和特罗勒尔认为学科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基于内部原因而产生的学科；一种是基于纯粹学术界影响范围之外的原因而产生的学科。<sup>[17]</sup>因而学科外部史的书写既“师出有名”也必不可少，尤其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这样深受政治形塑的学科来说，外部史叙事方式不可或缺。

#### (一)以学科建制化为中心

建制化是学科化的特征之一。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学科建制化应运而生。有学者就曾指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的制度结构。”<sup>[18]</sup>学科建制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事知识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组织机构，包括以学科为院系划分标准的高校、科研机构等；二是跨机构、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学科共同体，如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各地方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三是学科成果评价标准和发表平台，如各学术期刊；四是人才培养和管理制度，涵盖学位等级、课程设置、水平标准等，如专业目录、学科目录、学位条例、专业评价制度等；五是学术水平评价、奖励和资源配置制度，如科研基金、学科评估制度等。<sup>[19]</sup>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是在19世纪后期开始的，后又参照苏联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并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之下引入西方学科教育，而后开始独立探索学科体系建设。1978年后重新启动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恢复重建学科体系。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

“985工程”“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等系列推动学科教育体系的发展战略。伴随着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发展变迁，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也随之变革调整。

由高放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述略》根据学科史叙事方式大体也可分为内史和外史两大部分，其中后半部分外史涉及学科建制的前三点内容。包括：从事学科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学科共同体（主要包含研究机构和学会）以及学术期刊。该著作详细整理了截至1990年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硕士学位点共29个，其中同时拥有博士点的有5个。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2022年最新数据显示，拥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的高校、党政院校共计24所，其中同时拥有博士点的有17所。简单对比就可发现，经过30多年的发展，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不断完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硕士学位点不增反降，这其中所透露的信息不仅与学科内部体系整合有关，更是与学科外部政治、社会环境、学科建制的变革调整相关。《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述略》作为一本系统化学科发展史著作，在学科建制化研究方面还罗列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机构和学会，包括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以及河南省、湖南省、北京市等省市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和研究机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刊物也做了简介，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和《科学社会主义》。<sup>[20]</sup>

经过几十年的学科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共编纂了近200本教材。<sup>[21]</sup>其中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教材影响力较为深远，如，1983年高原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写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1985年赵明义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三本是当时高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的主要教材。1983年范若愚、江流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是全国党校系统的主要教材。还包括90年代高放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为今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很好的范本。<sup>[22]</sup>王怀超还对比了教材内容结构的变化，发现随着学科细化和分化，很多原本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被其他学科分走，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内容

受到相当程度的挤压。<sup>[23]</sup>学科建制化还包括学术水平评价、奖励和资源配置制度,如科研基金。通过查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发现,从1994年至今,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名的立项仅19项,其中重大项目3项。而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相关立项达121项,重大项目11项。

这其中的缘由同样与学科内外各环境因素息息相关,为我们研究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路。总的来看,目前为止这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建制化研究较少,缺乏系统化、规范化的学科体系研究。

## (二)以“人”为中心

研究发现,科学社会主义内史与外史书写中都包含以“人”为中心。然而内史中的以“人”为中心仅以学人为载体,作为划分学科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或者范式理论的界定指标;外史中的以“人”为中心则是结合学者的学术生涯,映射出其背后学科的发展脉络。前者偏向于理论研究,探讨学人对学科理论的贡献;后者则更趋于经验研究,涉及学人对学科建制化各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但在既有研究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缺乏,即使有所关联,往往采取的还是传统的人物传记式的叙述方式。而无论是以“人”为中心的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所呈现出来的都是“断裂式”“分层化”的历史研究。范式理论的相互继承与转化、学科建制之间的发展与更替,这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与规训,都将是学科史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

自2011年起,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的《科学社会主义》期刊专门开设了一个专栏——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名家介绍。如2012年第一期的文章“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界的领军人——赵曜教授学术成就述要”,大体从四个部分展开论述,分别为:一是生平简介;二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贡献;三是对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贡献;四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学术活动的推动。其中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紧密相关的是第二和第四部分,分别探讨了赵曜在学科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功绩。<sup>[24]</sup>《科学社会主义》期刊运用相似的书写方式介绍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界的各位名家,包括:肖冬松教授、许耀桐教授、包心鉴教授、李忠杰教授、闫志民教授、孙代尧教授等。

这种叙事方式更倾向于人物传记式,研究落脚点在于“学人”而非“学科”。聚焦于学人对于学科的贡献,而非从学人的“学术生命历程”切入,窥视背后“形上”的学术思想和“形下”的社会政治变迁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与规训。

## 三、“内史”与“外史”的关联

库恩划分的科学内部史和科学外部史同样适用于细分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这种分类方式既具备学理合法性也兼有实际可操作性。一方面,学科既是知识系统分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教育体系发展的产物。换言之,它不仅会受到知识的作用还需要就学科制度体系的发展演化作出回应。因此,就学科史研究而言,除了需要关注学科本身内部的知识体系、学科共同体即学术与学人,形上的学术思想和形下的政治社会生活同样不容忽视。概言之,在学科史研究中,内部的学术、学人,外部的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都需重视,缺一不可。学科史书写理应形成学术、学人、外部环境因素“三位一体”的分析模式。另一方面,综观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叙事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讨,更倾向于学术思想史的叙事方式。与之相对应的结果就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叙事热衷于对学科内部知识体系的更替、研究方法的演进、话语体系变迁等的探究。如前所述,学科发展绝不仅仅涉及知识体系的构建与演化,学科自产生之日起就无法脱离知识体系、制度体系的形塑与规训。因此,正是基于以往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叙事方式的不完善,客观上需要运用区分内史和外史两种书写方式,来警惕并完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的研究。

将内史与外史作为划分其学科发展历史的标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首先,这种划分方式更便于观察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研究的视角。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研究视角繁多,包括理论研究、建制化研究、学科问题等多个落脚点。综合来看,可以统合成两大类叙事方式,即内部史与外部史。据此可以更生动、直观地探究学科史的研究视角。其次,有助于促进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研究规范化。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学科建构与演化离不开政治社会体制的形塑,而这一点在以往单一的学术思想史叙事中难以体现。外史则更能映射学科发

展背后各力量的相互博弈与妥协。其中的以学科建制化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分别突出学科制度与学人这两大切入点,更能综合化、规范化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的研究。同时,有利于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研究本土化。由于正如前文所言,学科史研究离不开形上的学术思想和形下的政治社会生活,尤其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这门特殊学科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库恩的学科史划分虽属西方的研究范式,但是以此划归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也非常契合。更能凸显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环境因素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影响。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实现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综上,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有两种叙事方式,见图1。其中内史是聚焦于学科史的中间环节:学科本身,关注的是学科内部知识体系的构建、更替及完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内史研究进一步可以划分为“以范式理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以范式理论为中心围绕着范式理论的产生与转换;以“人”为中心侧重于将“人”作为学科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准;以问题为中心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内部各理论问题。这部分内史的叙事对于厘清整体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历史发展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始终没有跳脱对学科本身的研究范畴,囿于学科史书写的中间环节,没有关注到学科发展背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对它的形塑与规训。同时,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内史研究更倾向于学术思想史,围绕着某种或多种知识体系、方法体系,以时间或直

接以学派、理论为划分标准,组织联结形成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可想而知,这种方法所呈现出来的学科史必定是“断裂式”“分层式”的历史,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

在与之相对应的外史叙事中,又可以细化为“以学科建制化为中心”及“以‘人’为中心”。这里的以“人”为中心区别于内史的以“人”为中心。在外史中强调的是学人与学科的互动关系,进而映射出整体的学科发展状况。以学科建制化为中心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事知识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组织机构;二是跨机构、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学科共同体;三是学科成果评价标准和发表平台;四是人才培养和管理制度;五是学术水平评价、奖励和资源配置制度。外史叙事在关注学科本身发展的同时,通过监控学科建制化及学人的学术生涯,试图探索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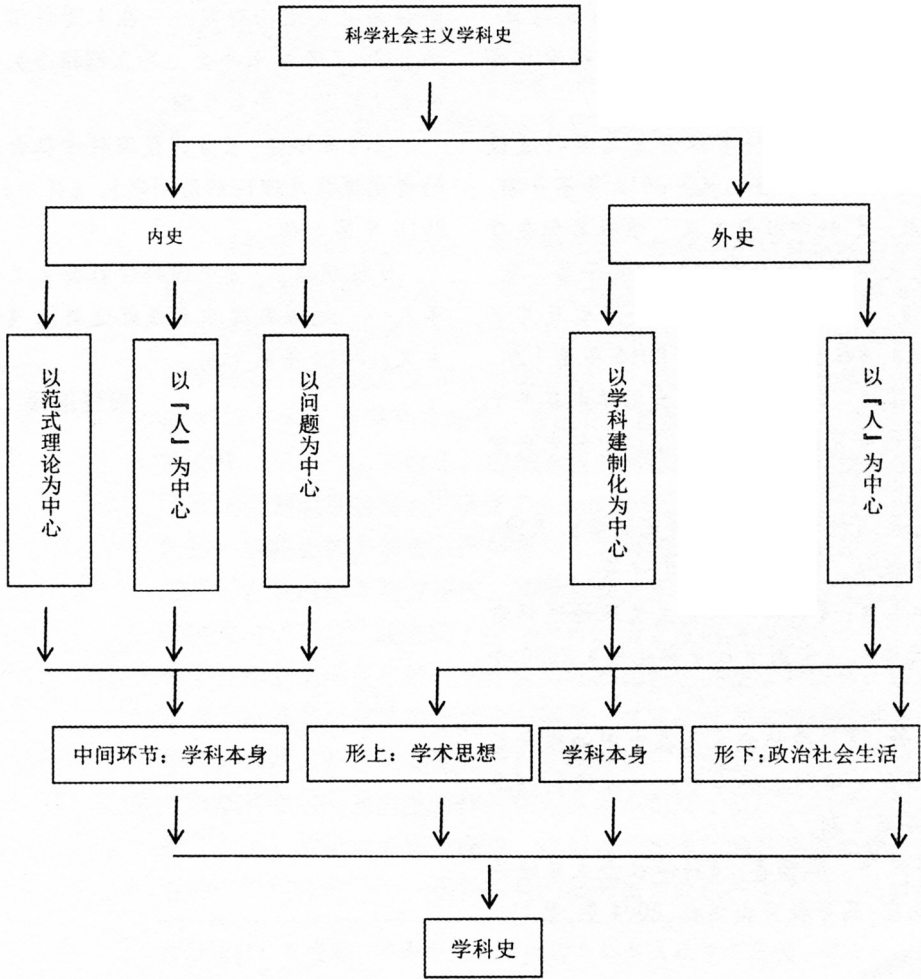


图1 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两种叙事的关系图



的学术思想和形下的政治社会生活对学科发展的影响与渗透。综观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外史的叙事可以发现,学科建制化研究中,主要是通过学科建制化过程,呈现了学科制度体系对于形上的学术思想和形下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回应,间接展示了学科背后政治、社会、文化等对其的规训与形塑。外史中的以“人”为中心则更倾向于人物传记式研究,介绍学人的生平事迹,重点聚焦于学人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外史叙事虽然跳脱了学科本身,但若过分强调外史书写,免不了自我建构的嫌疑。因此,外史不能脱离内史而存在,我们应采取内外史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形上的学术思想、形下的政治社会生活以及中间环节:学科本身,勾勒出动态的、生动的、连续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史。

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有内史和外史两种叙事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叙事方式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存在。与之相反,二者应该是一体两面,缺一不可的关系。如前所述,纯粹内史维度的学科史研究,无论是以范式理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始终囿于学科自身的体系范围之内,这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特性相悖。同样的,纯粹外史维度的学科史研究,若过分强调以学科建制化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则不免会陷入学科史自我建构的嫌疑。因此,在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研究时,我们理应追求的是综合内部史和外部史的研究,打破单一研究视角的局限,跳脱单调的学科本身研究的藩篱。既要立足于内史研究,以保证学科史研究的历史连续性,又不能忽视外史研究,来更好地凸显学科外部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的规训。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史两种叙事的结合与深化,推进学术、学人、学科“三位一体”的学科史研究方法的演进。

#### 参考文献:

- [1]D. V. Engelhardt, "Diskussionsbeitrag: Dimension und Aspekte der Entstehung neuer Wissenschaften in der Neuzeit",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I, 1978, pp.173-174.
- [2]阿梅龙:《建构中国近代学科的分析框架——西方学科史理论的借鉴》,《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 [3]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T.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10.

[5]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5页。

[6]李道中:《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逻辑起点和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7]薛红焰:《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

[8]高放:《“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名称要改为“社会主义学”》,《社会科学》1990年第7期。

[9]李俊:《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当议》,《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10]王怀超:《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11]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述略》,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7页。

[12]李志勇:《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看中国制度优势》,《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3期。

[13]关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践行与发展——以重大难题求解为中心的阐释》,《探索》2020年第3期。

[14]薛汉伟、陈锡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15]乔耀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16]R. P. Multhan, "Editorial", *ISIS*, vol.69, 1979, p.485.

[17]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唐跃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5页。

[18]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9页。

[19]何明:《“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张力及其消解——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和再建制化》,《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20]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述略》,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16页。

[21]王怀超:《当前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研究现状及理论前沿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22]王怀超:《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报告》,《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

[23]王怀超:《当前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研究现状及理论前沿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24]胡振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界的领军人——赵曜教授学术成就述要》,《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